

边疆研究

从行省到督抚： 元明清云南政治统一的制度路径

孙大江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治理始终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民族成分复杂、地理环境特殊，是历代王朝治理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纵观元、明、清三代对云南的治理实践，可以清晰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不断强化中央权威，确保政治上的统一与长期稳定。云南从地方割据势力并存的区域，逐步融入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体系，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历史缩影。

行省建制：元代政治统一的关键一步

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云南正式纳入元朝的统治版图。对西南边疆而言，政治统一并非一次性完成的军事结果，而是一个通过制度整合逐步实现的治理过程。元代在云南推行行省建制，正是将边疆地区由军事控制转化为行政治理的关键制度安排，是国家政治统一在西南地区的稳定实现的重要标志。

元初统一云南后，中央在治理策略上采取了较为审慎的过渡方式。为降低统治成本、缓解地方抵触，元朝沿用地方部落首领的既有权威，在其辖地基础上设立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军事统领机构。元初云南共设万户府十九处，主要分布于滇中、滇西及滇西北地区。这一制度在承认地方势力现实存在的同时，将其纳入王朝的军事指挥体系，为进一步推行统一行政体制创造了条件。随着云南地区秩序逐步稳定，原有以军事统领为核心的治理方式已难以满足赋税征收、户籍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需要。1276年，元朝正式在云南设立行中书省，标志着云南开始全面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的行政体系。赛典赤·赡思丁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任职六年间，通过制度改革推动了云南由“军事边疆”向“行政省区”的根本转变。

首先，行省制度确立了统一的政令体系。赛典赤将原有万户府等军事机构纳入行省管辖，明确军政分离原则，武官不得干预民政，赋税、司法与地方行政事务由行省统筹。重要政务需经行省审核，省级官员可奉敕调兵维持秩序。这一制度在保障中央权威的同时，削弱了地方军事独立性，使政令上下贯通，体现了政治统一对制度集中化的内在要求。

其次，行省建制推动了云南行政体系与内地的一体化。元代在云南建立路、府、州、县四级行政结构，下辖四十余路、七府、百余州县，形成覆盖全省的基层治理网络。相较于汉唐时期郡县制时强时弱、范围有限的状况，元代行省在建制完备性和治理广度上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明清基本沿袭此格局，直到近代，云南仍有大量县级建制源于元代，彰显了行省制度在巩固国家统一方面的深远制度效应。

再次，省治中心的确定强化了政治整合。元代将云南行省治所由大理迁至昆明，并借助昆明地处滇中、交通联络内地更为便利的区位优势，加强对全省的统摄能力。此后，昆明逐渐发展为云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延续至今。这一空间布局的调整，本质上是政治统一在地理层面的再组织。

元代在云南推行行省制度，是中国边疆治理史上的重要制度创新。它以行政建制取代单一军事控制，使云南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与内地的同构统一，不仅强化了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也为后世王朝在云南行使主权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从政治统一的角度看，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权力首次在该地区实现了持续、系统的制度化运行。

府县与卫所并行：明代对统一治理的制度深化

明代统一云南后，在元代行省基础上深化制度建构，通过府县与卫所并行，实现了对统一治理的制度化推进。

一方面，明朝设立省级治理架构。1382年设云南布政使司，主管民政与财政；并设都指挥使司掌兵权、按察使司掌司法，形成“三司分立”的地方治理格局。省以下设府、州、县各级政权。1382年，明廷在云南设置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意在以郡县制实现对边疆的直接统治。然而，由于云南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土司势力根深蒂固，流官制度在部分地区推进受阻。对此，明朝并未放弃政治统一的目标，而是对治理方式作出调整：一方面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部分土司势力集中的地区划归四川、贵州；另一方面依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实行分区治理，在滇中、滇东推

行流官统治，在边疆民族地区继续保留土司制度，最终形成府、州、县与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并存的治理格局。这种因地制宜的制度设计，将不同治理形式统一纳入布政使司体系之下，中央权力以更具弹性的方式实现覆盖，避免制度推进脱离现实基础，从而维护整体政治秩序的稳定。

另一方面，卫所制度成为巩固统一的重要支撑。平定云南之初，明朝即在各要害地区设置卫所，留驻大批军队，并由云南都指挥使司统一统辖。至洪武后期，云南共设二十卫、十八所，形成覆盖交通要道与战略节点的军事网络。卫所并非临时驻军，而是制度化、长期化的国家权力存在形式，在防御、治安与行政协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卫所与屯田制度相结合，使边疆军事力量具备相对独立、可持续的经济基础。军屯所产粮食与月粮制度相配合，减少了对地方临时摊派的依赖，降低军民矛盾风险，有助于将军事控制转化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由此，军队不仅“可守边”，也“能安民”，为中央政令在边疆的长期贯彻提供了现实保障。

明代云南政治统一的制度深化，通过府县与卫所并行运作，构建起覆盖行政、军事与经济的制度网络。政治统一从征服与驻防转向融入日常治理，中央权力得以持续稳定运行于西南边疆。

督抚共治与改土归流：清代统一治理体制的确立

清代对云南的治理，标志着边疆政治统一从相对分权的制度安排转入以督抚体系为核心的高度集权化阶段。1659年清军进入昆明，西南边疆正式纳入清王朝统治格局。清初行政建制大体沿袭明制，但将明代临时差遣的督抚固定化、常态化，设云贵总督为两省最高军政长官，巡抚分掌一省政务，形成长期运行的地方最高行政体系，将中央权威稳定落实于边疆。

然而，清初政治统一在云南并未真正完成。清廷沿袭前朝“以藩镇制边”的思路，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授予其高度

集中的军政权力，使其在云南形成事实上的“藩镇统治”。吴三桂不仅控制军队与财政，还干预地方官员任免，严重削弱督抚体制的实际效能。康熙帝亲政后，随着全国局势趋稳，清廷开始系统推进削藩。收回吴三桂军政与用人权力，最终在其叛乱后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藩镇问题。1681年平定三藩，成为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转折点。

元、明以来，云南虽设省级行政机构，但中央权力始终受到世袭贵族与藩镇势力的制约。元代设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却同时封蒙古梁王与大理王后裔，分割地方权力；明代虽行“三司分治”，但沐英家族世袭镇守云南，形成事实上的军政掣肘。清初亦沿此旧制，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总揽云贵军政大权，不再允许王公贵族世守地方，改由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作为常设省级最高长官，直接对中央负责。至此，云南地方权力完全纳入国家官僚体系之内，政治统一由此获得稳定而制度化的保障。

在废藩基础上，清廷进一步通过改土归流推进边疆治理深度整合。康熙乾隆时期，云南陆续裁撤宣慰司、宣抚司等土司机构，改设府、州、县，由中央任命流官治理。改土归流的根本目标是消除地方权力的制度基础，赋税、司法、军政事务逐步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云南省级以下治理结构由此与内地实现制度同构，地方权力运行机制从依附族权、土权转向以国家法制和官僚制度为核心。鄂尔泰厉行改土归流，张允随在云南兴修水利、开垦农田，进一步巩固了政治统一的制度成果。

清代通过废藩、设督抚、行政土归流的制度组合，地方权力不再分散于世袭贵族、藩镇或土司体系，而是集中于对中央负责的流官体系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安排，使云南在政治结构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域纳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履踏遍滇云 文脉永留三迤

——《南滇履痕》出版侧记

徐睿 柴锐



昆明海埂大坝上的杨慎雕像。耿嘉 摄

在明代文坛的璀璨星河中，杨慎以“明代三才子之首”的盛名，凭借一腔孤忠与满腹才情，在云南留下了跨越五百年的文化印记。《南滇履痕》作为滇版精品出版工程重点项目，正是对这位文化巨匠沉重三十余年心血的系统整理与深情回望。它以汇集汇注的严谨姿态，收录杨慎在滇核心著述，既还原了明代云南的山川风物、历史脉络，更勾勒出杨慎以文润滇、以学兴滇的不朽功绩，是读懂云南文化根脉、触摸明代边疆文脉的必读经典。

全书以《滇载记》《滇程记》《云南山川志》《寓滇集》为核心，辅以云南文化大家方树梅(1881—1968)所辑抄的《升庵年谱》，构建起完整的“杨慎与云南”文化体系。没有晦涩的学术堆砌，没有生硬的史料拼接，以通俗流畅的文字、精准清晰的校注，让五百年前的滇云往事、文人风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翻开书页，仿佛跟随杨慎的脚步，从滇池泛舟到苍山踏雪，从永昌戎所到大理古刹，在字里行间读懂他对云南的深情，更读懂他如何以一己之力，为边疆文化点亮星火。

以史为笔，梳理云南历史发展脉络

在杨慎成滇之前，云南的历史长期散佚于民间口述与少数民族文献之中，汉文史籍记载寥寥，南诏国、大理国的兴衰脉络模糊不清。杨慎以史学家的严谨，深入民间搜集《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等典籍，删正芜陋、梳理脉络，撰成《滇载记》，清晰还原了从九隆族起源、南诏统一六诏，到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元明平定云南的完整历史，明确了南诏、大理七姓政权的关系传承，填补了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空白。他笔下的云南，不再是中原视角的蛮荒之地，而是有着清晰历史脉络、独特文明传承的一方沃土。同时，《云南山川志》以实地考察为根基，详细记载了金马山、碧鸡山、点苍山、滇池、洱海等百余处山水地理，精准描述地貌特征、水文走向，成为明代云南自然地理的权威图鉴，为后世研究云南地理变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南滇履痕》不只是一部文献合集，更是一部精神史诗。杨慎在滇三十余年，身处逆境却从未消沉，以“好句穷理，老而弥笃”的执着，著书四百余种，将毕生所学奉献给云南这片土地。他不仅是记录者、创作者，更是云南文化的建设者与传承者。他整理古籍，让云南历史得以留存；他讲学兴文，让边疆文脉得以延续；他以文献著述，让中原与边疆的文化交融更深一层。

以文为桥，让中原文脉浸润滇云大地

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谪戍云南，政治理想受挫，却将全部才情倾注于云南的文学与教化。《寓滇集》收录其在滇诗作百余篇，从《滇海竹枝词》的市井风情到《宿金沙江》的思乡忧愤，从《海风行》的苍山壮阔到《安宁温泉》的闲适恬淡，每一首诗都镌刻着云南的印记，也承载着文人的风骨。他的诗打破了明代文坛复古桎梏，以“诗道性情”为核心，将中原诗歌的格律意境与云南的山川

民俗相融，开创了滇南诗坛的全新风貌。更可贵的是，他在滇期间广交文人，开讲学，与李元阳、张含等结为“滇南七子”，以诗文唱和带动滇南文风兴盛；在滇池畔建“碧晚精舍”，成为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流的核心场所，让“滇南樵斧之习，化为邹鲁洙泗之风”。他不分民族、不分贵贱，传道授业，让读书向学之风在云南遍地开花，以一己之力提升了云南的文化水准，成为中原文化入滇的关键桥梁。

以行记述，还原明代云南交通与民生全貌

《滇程记》是杨慎行走云南的“行程笔记”，更是明代云南交通、民俗、物产的“百科全书”。他详细记录了从中州入滇的东、西、古三路驿道，标注每一处驿站、渡口、关隘，描述道路险易、气候物产，兼及少数民族风俗、方言谚语、社会民生，是系统记载明代云南交通路线的重要档案文献。书中既有“四十八渡脚不干，前头又上马鞍山”的行路艰辛，也有对苗族、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习俗的生动记录；既有澜沧江、博南山的壮阔景致，也有边疆市集、商贸往来的烟火气息。这些文字不仅是文学佳作，更是研究明代云南交通史、民族史、社会史的珍贵史料，让后人得以窥见五百年前云南的真实生活图景。

以心为炬，留下跨越时空的文化精神

《南滇履痕》不只是一部文献合集，更是一部精神史诗。杨慎在滇三十余年，身处逆境却从未消沉，以“好句穷理，老而弥笃”的执着，著书四百余种，将毕生所学奉献给云南这片土地。他不仅是记录者、创作者，更是云南文化的建设者与传承者。他整理古籍，让云南历史得以留存；他讲学兴文，让边疆文脉得以延续；他以文献著述，让中原与边疆的文化交融更深一层。《明史》赞其“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而云南百姓则尊其为“先贤”，世代祭祀。他的足迹遍布滇云，他的文字浸润边疆，他的精神早已融入云南的文化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

一履留痕，文脉千秋。《南滇履痕》浓缩了杨慎与云南的半生情缘，也浓缩了明代云南的文化风华。它既是古籍整理的精品力作，也是普及云南历史文化的通俗读本；既适合史学研究者深究，也适合普通读者品读。读懂《南滇履痕》，便读懂了云南的文化根脉，读懂了一位才子与一片土地的深情羁绊，更读懂了中华文脉绵延不绝、多元交融的磅礴力量。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位热爱云南、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细细品读的佳作。

（作者单位分别系云南民族大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品“楹联第一类书” 感人间有味清欢

——梁章钜《楹联丛话》述略

邓亚

楹联，又称对联、对子等，是悬挂或张贴于壁间柱上的联语。作为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学样式之一，楹联文化源远流长、意蕴丰厚，在千年传承中积淀出体量庞大、内容丰赡的文献宝库。其中，清人梁章钜所编《楹联丛话》堪称“楹联第一类书”，在楹联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书首次系统收录、梳理、考订、归类并品评历代楹联佳作，梳理楹联文化的千年脉络，让我们在字字一联的涵泳中体味人间清欢。

楹联发展及各类楹联著述

关于楹联起源，学界有六朝、五代及唐代等多种说法，皆可见其诞生甚早。唐宋时期，楹联已应用于家居及殿堂楹柱，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元明以后，楹联创作明显增加，春联之正文即始于明太祖时期。清代是楹联发展的鼎盛时期，“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备于此时者”，楹联不仅数量激增，形式多样，更得到文人雅士前所未有的敬重，汇集与评述之作逐渐兴盛。据目录统计，清代楹联类著述有200余种。

历经千年积淀，楹联名目日益繁多，题材渐趋丰富，应用更为广泛，在庙堂、山林、书斋及市井之间均可见其身影。楹联与书法篆刻、园林建筑、时令民俗等密切相关，在不同场域中扮演不同属性角色。近现代以来，楹联发展蒸蒸日上，1984年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吸引了大批楹联艺术家和研究人员，各类楹联典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楹联兼具严肃性、风雅性、实用性、娱乐性等多重属性于一身，已成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汗牛充栋的楹联典籍中，清代道光年间问世的《楹联丛话》，是楹联整理及研究的重要起点，被誉为中国楹联类典籍的开山之作，学者白化文称其“标举宗风，扶轮大雅，综前启后，述往开来”。

梁章钜与“楹联第一类书”《楹联丛话》

梁章钜(1775—1849)，字因中，一

字茵邻，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博学多识，著作等身。章钜出身书香门第，明清时期，梁氏家族连续十五世出有秀才，纪昀督学闽省时，称赞“闽中书卷世家，以长乐梁氏为第一”，并赠“书香世业”之匾加以表彰。受家学熏陶，梁章钜自幼便与楹联结下不解之缘，其父为人书写楹帖必用格言，并教导梁章钜：有人求字，若不用格言回应便是无益之事。其父又常以自撰及其伯父所撰楹联教章钜：如以楹联“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指点修身自持之要；以楹联“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只看花”，指点为人处世之道。梁章钜父亲对楹联的格言教化功能极为重视，潜移默化中牵引了梁章钜对楹联的关注。

梁章钜喜爱楹联，亦擅长创作楹联，以楹联为触媒，与师友间多有趣联、赠联趣事，这是他与楹联的另一缘分。其中，梁章钜七十寿辰时，好友王叔兰所赠楹联尤值得一提，联语云：“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还朝，五十出守，六十开府，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简如《格言》，详如《随笔》，博如《旁证》，精如《选》”语，巧如《联话》，高如诗赋，略如平生著述，千秋大业擅名山。”这副贺寿联以简短的74字将梁章钜为官为文的人生经历与著述成就熔铸于字里行间：上联简述梁章钜的仕途之路及解甲归田后的逍遥闲暇，下联赞颂梁章钜的诸多著述，或简约，或详实，或渊博，或精审，或巧妙，或高远，足以藏之名山传世。联语衔接自然，又如潮水奔涌般一气呵成，气势磅礴，读此联，似已识得联中人之风貌观其一生。

王叔兰寄祝楹联中“巧如《联话》”一语，即指梁章钜所编《楹联丛话》，该书成书于道光庚子(1840)年。梁章钜感佩古代楹联“载籍者寥寥”且“无荟萃成书”，若“任其零落湮沉，殊可惜”，于是“博访遐搜，参以旧所闻见”，略条其义类，次其后先，编撰《楹联丛话》，书中收录五代至清代的联语600余则，涉及楹联1700余副。

参照传统文话、诗话、词话的文论样式，梁章钜创立了“联话”这一体例，将楹联与诗词曲赋等并置，《楹联丛话》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的联话著作。而称《楹联丛话》为“楹联第一类书”，则因其具有显著的类书性质。类书是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文献种类，主要性质为资料汇编与分门别类。《楹联丛话》首次辑录汇编并分类排列楹联材料，基本确立了楹联分类体系及类目设置，对后继诸多联话、联语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毫无疑问，《楹联丛话》对所收材料的处理方式，借鉴使用了“类书编撰手法”，是楹联专业性类书。

《楹联丛话》中的有味清欢

《楹联丛话》将所收楹联材料分为故事、应制、庙祀、解嘲、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包括集字)、杂缀(包括谐语)十类，基本囊括了古代楹联的主要类型。梁章钜还对诸多楹联附以考订、品评文字，全书构筑起一个有声有色、有趣有味鲜活楹联世界。信手翻阅，处处充盈着人间有味清欢。

联中蕴心。《楹联丛话》所收各类楹联，清欢异趣。略举几类言之，胜迹类收录大量名胜古迹楹联，如西湖花神庙楹联、湖南岳阳楼楹联、济南趵突泉楹联、云南大观楼长联等。所涉山有水、有寺有观、有祠有庙、有亭有园……其间清欢是远离尘世喧嚣，悠然自适的山林之乐。如桂林仙李园郭亭楹联：“乍来顿远尘嚣，静听水声真活潑；久坐莫嫌荒僻，饱看山色自清凉。”联语清丽淡雅，意境浑成、韵味悠远，结合听觉与视觉，抒发身处自然之中的清凉心境。又如云南海心亭楹联：“有亭翼然，占绿水三分之一；何时闲了，与明月对饮而三。”上联“有亭翼然”，借用欧阳修《醉翁亭记》“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典故；下联“与明月对饮而三”，借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典故。描绘海心亭形貌之美的同时，表达对逍遥闲适生活的无限憧憬和期待。

格言类收录大量书院、厅事、书斋题联，如桂林秀峰书院楹联、广州香山书院楹联、月川书室楹联等，其间清欢是修身养德、持正守心、淡泊明志的君子意志。如福州鳌峰书院楹联：“反己自有真修，须留神检到心身界上；加工无别法，务着力打开义利关头。”上联强调自我反思修行，心身内外兼修，与儒家“吾日三省吾身”、反求诸己的内省精神一脉相承；下联则用加工比喻勉励提升关键在明辨道义与私利。联语质朴而意蕴深厚，透澈玲珑，亮人心湖，不仅是书院精神的宣言，更是君子之道。梁章钜称赞其“雅似先儒语录”。又如采自《随园诗话·补遗》的书斋楹联：“无求便是安心法，不饱真为却病方”，直言无欲则刚的安心方法与节制饮食的养生良方。

杂缀类收录春联、文人酬赠楹联及行业联等。那些看似寻常的行业联尤其耐人寻味，其间清欢是街头巷陌间的市井风流、人间烟火中的温暖雅致。如悬着“整容堂”牌匾的理发店中楹联：“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联语自然不事雕琢，画龙点睛地照应店中理发营生，巧妙至极，无怪乎梁章钜评价其“虽巧而不伤”。又如大路边茶亭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盞，各自东西。”上联借用佛家用语“四大皆空”，自然带出茶客不分你我，众生平等的意味；下联指明人生各有方向，杯空茶罢后各自东西，聚散无常。联语“看似寻常最奇崛”，不仅契合茶亭经营，更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人以艺术享受，回味无穷。梁章钜言其“浅语颇有禅理”，切中肯綮。

清人张潮云：“谈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谈诸集宜春，其机畅也。”那么何时宜读楹联呢？或许答案是春夏秋冬，四时皆宜。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若觉得经史子集枯燥浩繁，那便偶尔留出片刻闲暇品读言短意长的楹联吧，其中有无穷人间的有味清欢。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